

我的「神明記事」 - 所謂武廟者即非武廟是名武廟 ~ 一場跨越千年的名實之辯

這篇「武廟」，最初是想為關羽而寫，寫啊寫著，發現應該為姜子牙寫才對，但是隨著參考文獻愈來愈多，最後竟然發現關羽的「武廟」和姜子牙的「武廟」，落到一個「武廟」各自表述的田地。

武廟究竟為關羽還是為姜子牙而設？此一看似單純的疑問，實則觸及一段橫跨千年的複雜歷史。今人所認知的「武廟」，多半指向供奉關羽的關帝廟，然而，這僅是這場名實之辯的最終章。事實上，「武廟」從來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概念，其主神、祭祀對象與背後所承載的國家意志，在歷史長河中歷經了數次根本性的轉變。

可爭議的核心論點即在於此 - 所謂的「武廟」，是一個不斷流變的概念，其名稱(名)與實際內涵(實)在不同朝代「各自表述」，完美印證了「所謂武廟者，即非武廟，是名武廟」的哲思。從唐代為平衡文廟而創立的國家祭典，到宋代以儒家道德為標尺的徹底洗牌，再到明代因君臣倫理而被廢止，最終在清代由關羽的忠義形象借其名而易其實，「武廟」之名未變，其實質卻早已脫胎換骨。

接下來，我們依循歷史的脈絡，層層剖析武廟從創立、演變、廢止到重生的完整歷程，揭示其背後隱含的政治風向與文化價值的變遷。

官方武廟的緣起

唐代，一個國力鼎盛、開疆拓土的時代，對軍事力量的尊崇達至新的高度。在國家禮制中，通過祭祀先賢來建構一脈相承的「治統」(genealogy of governance)，以彰顯當朝統治的正當性，乃是重要的政治舉措。在此背景下，為平衡已成國家意識形態核心的「文廟」(孔廟)，建立一套與之並行的武學祭祀體系，成為彰顯「文武並重」治國理念的國家級政治工程。官方武廟的設立，正是此一政治與宗教衝動下的必然產物。

官方武廟的濫觴，可追溯至唐玄宗開元十九年(西元 731 年)。朝廷下詔設立「太公尚父廟」，將祭祀歷代名將正式納入國家典制。其核心祭祀對象，正是被後世尊為「兵家十祖」的姜太公(太公望)。與此同時，以漢初謀臣張良為副祀(亞聖)。此一選拔標準著重於「功業著著、宏濟生民者」，深刻體現了唐代統治者對兵法謀略正統性的高度尊崇，時人普遍認為張良曾獲《太公兵法》真傳，在戰略思想上承繼了姜太公的衣鉢，故將其置於配享的最高位置，以確立武廟的道統源流。

為對標文廟，朝廷參照「孔門十哲」的制度，選出了最初的「武廟十哲」，分列於姜太公神像兩側：

- 左列：白起、韓信、諸葛亮、李靖、李勣
- 右列：張良、田穰苴、孫武、吳起、樂毅

祭祀的規格，包括禮樂編制與祭品，均與孔廟相同，以此確立了其崇高的國家級地位。

安史之亂的爆發，使唐朝的尚武精神面臨嚴峻考驗。為激勵將士、重振軍心，唐肅宗於上元元年(西元 760 年)追封姜太公為「武成王」。太公尚父廟隨之正式更名為「武成王廟」，簡稱「武廟」，其地位進一步鞏固，成為國家軍事榮譽的最高象徵。

至此，唐代創立的武廟是以姜太公為核心、表彰歷代軍事統帥的國家祭典。然而，這個典範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政治風向的轉變，開始了其漫長而曲折的演化之路。

官方武廟的演變

武廟的從祀名單並非一成不變的榮譽榜，而是歷代統治者根據當下政治需求與道德觀念進行調整的動態晴雨計。每一次名單的增刪，都如同一面鏡子，清晰地反映出該朝代的價值取向與統治者的深層焦慮。

唐德宗建中三年(西元 782 年)，在禮儀使顏真卿的建議下，武廟的從祀名將一度擴充至六十四人。值得注意的是，關羽在此時首次以「蜀漢前將軍漢壽亭侯」的身份被納入從祀名單。然而，在眾星雲集的將帥群體中，他當時的地位相對普通，遠未達到後世「武聖」的高度。

儘管從祀的陣容在形式上擴大，但安史之亂的慘痛教訓，已在朝廷內部埋下對擁兵自重武將群體的深刻戒心。文臣集團開始對武廟的崇高地位提出質疑，認為過度尊崇武將有損君臣倫理。這種在正式尊崇與政治恐懼之間的內在矛盾，導致武廟的祭祀制度出現動盪，甚至一度廢除了「十哲」等制度，反映出文武關係的緊張氛圍與朝廷在尚武精神與中央集權之間的矛盾心態，因為他們認為姜太公身為臣子不宜以「王」身份受祭，且與十哲並非師徒關係，不合禮意、有違君臣之理。雖然唐德宗最終採取溫和意見，但仍降低了武廟祭祀的規格，標誌著尚武精神在官方祀典中的衰落。

宋太祖趙匡胤，一位以兵變黃袍加身的君主，對武將的潛在威脅有著更為清醒的認識。他對武廟進行了一次顛覆性的改革，其核心標準不再僅僅是赫赫戰功，而是儒家倫理下的「武德」。

建隆四年(963年)宋太祖親臨武廟時，曾指著白起的畫像說：「起殺已降，不武之甚，何為受享于此？」(白起屠殺已經投降的士兵，是極端不符合武德的行為，為何能在此接受祭祀？)在此「功業始終無瑕」的新標尺下，一批戰功彪炳但道德有虧的二十二名將被移出或降格，增加23人。這是武廟歷史上變動最大的一次：

- 白起：因「殺降」這一不人道的行為，被徹底移除。
- 吳起：因「殺妻求將」、「母死不歸」等個人私德問題，被從「十哲」降格至廡下。
- 韓信：因其最終的叛亂行為，被視為「功業有瑕」，遭到移除。

尤為關鍵的是，在此次改革中，關羽與張飛等名將亦被移出了從祀名單。這有力地證明，在宋初以「武德」為核心的價值體系中，他們的某些行為(如關羽的降曹)被視為「瑕疵」，使其不符合國家最高祭祀的標準。這次大調整表明宋朝君臣在從祀標準中，對道德因素(武德)的看重遠超過武功。

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武廟從祀體系徹底儒家化，仿效孔廟七十二賢人之制，主祀姜太公，張良單獨配享(地位最高)。殿上設置十人(實為十哲)，兩廡從祀六十二人，推崇的武將典範轉向「儒將」，例如北宋名將曹彬，因其「寬仁謙遜」和符合儒家倫理的品質而被選入，武廟基本成為文廟的附庸。至此，武廟已逐漸失去其作為軍事象徵的原初功能，而轉為一種道德評價空間。之所以必須以儒家倫理作為武廟祭祀的最終判準，並非純然的思想選擇，而是出於一個在軍事長期處於劣勢、政權高度依賴文官治理的情況下，唯有將武德轉譯為可被文官體系監督的道德語言，國家才能在尊武與防武之間取得最低限度平衡的一種結構性的現實、一種制度性的防火牆。

元朝時，武廟地位進一步降低，僅祭祀姜太公和十哲，祭祀禮儀規格也被降低。

值得注意的是，當武廟在宋代逐步被倫理化、象徵化，其軍事實質功能不斷被抽離時，這並不意味著「武德象徵」在整個思想世界中同步消失。相反地，在官方禮制之外，道教神譜正逐漸承接並重組這一套被釋放出的象徵資源。

早在南朝梁代，上清派陶弘景所編定的《真靈位業圖》中，姜太公已被納入天界神聖秩序之內，其身分並非戰神或執法神，而是一位「受命而佐治、不僭權而成功」的真人型存在。這一定位，與其在歷史上「奉天討暴、功成身退」的形象高度一致，也顯示出道教在吸納歷史人物時，並不以軍功大小為唯一標準，而更重其是否符合天命、秩序與節制的倫理想像。

與此同時，關羽在宋代官方武廟體系中一度被排除，卻並未因此退出宗教世界。相反地，他的形象逐漸在民間與道教語境中被重新塑造，從具體的歷史武將，轉化為忠義倫理的化身。這種轉化並非來自國家授權，而是發生於宗教與地方社會的互動之中。

換言之，當國家禮制逐步收回、甚至終止「武廟」這一制度裝置時，武德所承載的象徵能量並未消散，而是轉而進入道教神譜與民間信仰體系之中，完成一次從「制度性評價」到「宗教性轉化」的移動。這也正是為何後世仍能見到以姜太公、關羽為核心的高度神格形象，卻已不再與原初的武廟制度形成對等關係。

此一現象顯示，所謂「武廟的衰落」，並非武德思想的終結，而是其載體由國家禮制轉向宗教宇宙的一次結構性轉移。

官方典制的終結

明朝的建立，標誌著武廟歷史的重大轉折點。開國君主朱元璋以其強勢的政治手腕和對國家禮制秩序的重塑，做出了一個廢止自唐代以來延續六百餘年的國家武廟制度的顛覆性的決定，體現了極致強化的君主專制。

朱元璋於洪武二十年(1387年)廢棄武廟制度，此舉並非一時興起，而是出於對國家祭祀體系中「治統」的根本性重整。他認為姜太公是周朝的臣子，以「王」的身份祭祀他，是「不符合理智」的僭越行為，嚴重破壞了君臣倫理，意在消除武將群體在皇權之外的任何精神歸依。

在朱元璋看來，一個獨立的、與文廟平行的武廟體系，其主神是一位臣子，這本身就構成了對君臣大義的挑戰。為了理順國家祭祀的倫理秩序，他決定徹底廢除武廟這一獨立的祭祀系統。

此決策的最終結果是：

- 廢除封號：撤銷姜太公的「武成王」封號。

- 廢棄武廟：下令廢棄全國的官方武廟。

那麼，被「降格」的姜太公去了哪裡？

朱元璋並非完全否定其歷史功績，而是將其重新定位，移入了「歷代帝王廟」，與周朝的歷代君主一同接受祭祀。在此，姜太公的身份發生了根本轉變，從一個獨立受享、統領歷代名將的武廟主神「兵家之祖」，被「正確」地安置回了其在「治統」中的位置，即附屬於周朝帝王的「從祀名臣」。

朱元璋選拔歷代帝王廟的從祀名臣時，忠心是首要標準，功勞次之。

- 對帝王的選擇：他確定了祭祀三皇五帝至明朝的大一統王朝開國帝王(16位)。秦始皇、晉武帝、隋文帝等則因「功德有瑕疵」而被排除在外。
- 對名臣的審核：朱元璋剔除了為宋朝開國立下大功的趙普，因為他認為趙普在皇位傳承上「不忠於宋太祖」。選擇這些名臣的目的是為天下臣民樹立忠君報國的典範。

明太祖的這一決定，徹底終結了自唐代以來以姜太公為核心的國家武廟體系。這一制度上的真空，為一個全新的「武聖」崇拜的興起，騰出了廣闊的歷史空間。

關羽信仰的崛起

官方武廟的廢止，在國家與民間信仰層面都造成了一個巨大的真空。當國家不再提供一個統一的武學偶像時，民間早已流傳的英雄崇拜便有了填補這一空缺的機會。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關羽的個人崇拜迅速興起，最終「取而代之」，成為新的武聖。

與唐宋武廟中那位因軍功入選的普通將領不同，關羽在明清兩代的崛起，並非源於其軍事才能的重新評估，而是其「忠義」品格在官方意識形態與民間道德敘事中的不斷拔高。

這種從「武功」到「道德」的價值轉向，恰恰迎合了後期帝國對臣子品行的最高要求。「忠」是對君主的絕對服從，「義」則是維繫社會倫理的基石。關羽的形象，經過小說演義的藝術加工和歷代統治者的不斷加封，被塑造成了忠義精神的完美化身，其道德感召力遠遠超越了其作為將領的歷史功績。

隨著關羽地位的飛速提升，各地自發興建或由官方敕建的「關帝廟」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逐漸在功能與象徵意義上取代了舊武廟。

歷史性的轉折點出現在清朝，統治者(滿族)面臨鞏固統治正當性的挑戰，因此對祭祀名單的調整，成為整合多民族帝國、宣揚忠義倫理的治理工具。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皇帝正式下詔，將祭祀關羽的廟宇稱為「武廟」，並將其納入國家祀典。清朝推崇關羽，重點是其所體現的以忠為綱的標準臣子形象，作為天下臣民忠君報國的典範等符合儒家倫理道德的品質，而非武功，反映了清朝統治者藉由推崇臣子的無條件忠誠來鞏固君主專制制度。這使得清朝的武廟性質上是文廟的附庸，用於鞏固統治。

乾隆時期，官方在歷代帝王廟的西配院內修建了關帝廟單獨祭祀關羽，形成了「廟中廟」的奇特格局。這種特殊待遇使關羽的地位超然於其他七十九位(或八十一位)歷代帝王廟從祀名臣之上。

至此，官方層面上，「武廟」的主神完成了從姜子牙到關羽的根本性替換。

然而，此「武廟」已非彼「武廟」。這是一個以「忠義」為內核、以關羽為唯一主神的全新祭祀體系。它不再有唐宋時期龐大的歷代名將從祀制度，其性質也從彰顯軍功和尚武精神的殿堂，轉變為宣揚儒家倫理、更像是「文廟附庸」的道德教化場所。

至此，武廟的主神已由姜子牙變為關羽，其內涵也發生了根本性轉變成了忠義倫理的宣傳工具，並將歷代帝王廟變成了一個超越狹隘民族界限、服務於中央集權和政治認同的歷史框架。而這種演變並未就此終結，在現代表現出了更多元、更具地方特色的形勢。

各自表述的武廟

武廟的概念並未靜止在清代的關帝廟，而是在不同地域的社會土壤中繼續演化，展現出與地方社群緊密結合的全新形態。其中，如台灣的幾座大型「文武廟」、「武廟」、「關帝廟」便是個極具代表性的案例。特別是「文武合祀」的獨特結構，同時祭祀代表「文」的文昌帝君或是孔子與代表「武」的關帝。這種結構不僅是宗教上的融合，更深刻地反映了其在台灣開墾初期所扮演的複雜社會角色，「廟」，不僅僅是一個宗教場所、是議事空間、是仲裁場所、是社區領袖們溝通的橋樑、是信仰在地化與功能多元化的生動體現、是慈善福利體系的基礎，更是維繫社群秩序的核心。

和朝廷的關係，早已不若從清、明、宋、唐。

總的來說，「武廟」從來就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定義。它如同一面棱鏡，折射出不同時代的政治訴求、道德標準與社會功能。國家級的祭祀名單從唐朝的「重武」需求，轉為宋朝的「重德」篩選，再到明朝的「重忠」專制，最終在清朝轉化為「以忠義為核心、以多民族共治為基礎」的政治意識形態工具，動態地反映了帝國治理的最高目標。其演變路徑清晰地勾勒出一條從國家到地方、從一元到多元的軌跡：

- 始於唐代(731)，它是以姜子牙為核心、彰顯軍功與謀略的國家典制，是尚武精神的最高殿堂，武廟規格一度與文廟平齊，後降級，十哲制度被削弱，強調禮制與君臣之理。
- 盛於宋代，武廟從祀名單大規模調整，剔除功勞顯赫但德行有瑕者，其入祀標準轉向以儒家道德為核心的「武德」，執行重文抑武國策，確保武將的政治忠誠和儒家道德，成為文治思想下的產物。
- 廢於明代(1387)，因觸及君臣倫理的紅線，廢除姜太公武廟，將其降格為歷代帝王廟的從臣。強化君主專制，樹立絕對忠君報國的臣子典範，國家級的武聖祭祀傳統戛然而止。
- 興於清代(1725)，其名號被用於追封以「忠義」為核心的關羽，藉由推崇忠義價值，服務於鞏固清朝統治和極致的君主專制，武廟廟宇內涵已與最初大相逕庭。
- 衍於當代，它化身為如「文武廟」、「武廟」、「關帝廟」般，與地方社會深度融合，展現出靈活而多元的面貌。

從姜子牙到關羽，從國家殿堂到街坊廟宇，「武廟」之名依舊，其實質卻早已歷經數次脫胎換骨。這正是歷史的弔詭與魅力所在 - 一個名稱可以在千年流轉中被不斷重新定義與詮釋，完美印證了「所謂武廟者，即非武廟，是名武廟」的深刻意涵。

回望今日街坊巷弄中的所謂「武廟」，我們或許已難再從中辨識唐人心目中那位象徵兵法、謀略與節制之武德原型，也未必意識到，這座名為「武」的廟宇，曾經刻意避免讓任何一位以血戰聞名、情緒與怨氣纏身的歷史人物居於其核心。制度所追求的，從來不是誰殺敵最多，而是誰最能代表「武力如何被安置」。

然而，當國家禮制退場、制度的語言逐漸失效之後，武廟的內涵也隨之轉移。一位原本以智取天下、功成而退的秩序設計者，被留在史書與道教神譜的高處，卻從實際的

廟宇空間中淡出；相對地，那位生前橫死、死後長期以厲鬼怨靈形象流傳於地方社會的武將，則在忠義倫理的再詮釋中，被層層淨化、拔擢，最終坐上了「武廟主祀」的位置。

這並非簡單的是非顛倒，而是一場象徵邏輯的轉換。

當制度不再負責節制武力，社會便轉而尋求一個情感上可被投射、道德上可被崇拜的對象。於是，武廟不再是一個討論「如何用武」的場所，而逐漸成為一個宣示「何謂忠義」的空間。那位真正曾為武力劃下邊界的人，反而顯得過於冷靜、過於抽象，不再適合被香火記憶。

從這個角度看，「所謂武廟者即非武廟是名武廟」，並不只是對制度消亡的感嘆，更是一個對神格選擇的反思。

當我們今日走進武廟，所面對的，究竟是對「武德」的追問，還是對「忠義」神話的安放？而那位曾經被國家、宗教與歷史共同認可的武德原型，又是在何時、以何種方式，被悄然請出了廟門之外。

至於正史中所呈現剛而自矜、好名而少容、忠於主而未必忠於國的關羽，其「武德」與「忠義」的神話，是後世倫理與信仰所完成的形象，主要是經由六朝志怪(約三至六世紀)、唐宋話本(約八至十三世紀)、元代雜劇(十三至十四世紀)，並在明代《三國演義》(十四世紀後期)中完成其「忠義化」的定型，而非正史原本給予的評價。

這並不貶損其歷史地位，卻提醒我們，神格的形成，往往比歷史更需要被解釋。

如果，您讀完這一篇，那我請您下次經過武廟時，停下來，觀想一秒鐘，那一秒鐘，或許正是那位曾為武力劃界的歷史原型，再度被想起的時刻。

後記

我之所以在這篇文章中反覆回到姜太公，並非出於對某一位神明的個人偏好，更不是意圖重新安排信仰高下。真正讓我感到不安的，是在長時間的制度史與宗教史閱讀中，逐漸意識到一種被忽略的落差 - 那位最早為「武力如何被正當化、如何被節制」劃下邊界的人，反而在後世的廟宇空間中變得越來越沉默，甚至消逝無蹤。

姜太公在歷史與早期道教神譜中，始終是一位冷靜而節制的角色。

他不是以血戰立名，也未曾以情緒動員群眾；他的功績建立在秩序設計、時勢判斷與功成而退之上。正因如此，他極少成為情感投射的對象，也難以被簡化為可供膜拜的道德符號。這樣的性格，在制度仍然存在時或許正是其價值所在，卻在制度退場、信仰轉向情感與倫理敘事之後，顯得格外不合時宜。

相對地，那些生平充滿悲劇張力、死後形象需要被反覆轉化與淨化的歷史人物，反而更容易成為信仰的核心。這並非誰的過錯，而是一種結構性的選擇結果。然而，當我們今日走進被稱為「武廟」的空間，卻已無法再辨識這層轉換時，我便覺得有必要停下來，替那位被請出廟門、卻從未失去其思想重量的人，說一些話。

替姜太公抱不平，並不是要請他回到香案中央，而是希望在我們談論武德、忠義與力量時，能再次想起 - 曾經有人嘗試讓武力服從於秩序，而不是讓秩序屈從於武力。若這份記憶能在某位讀者心中停留片刻，那麼這篇文章，便已完成它真正想做的事。

無名碑

姜太公，在現代社會中，已很少被人想起。

不是因為功業不夠，也不是因為名字不夠響亮，而是因為他太早完成了該做的事。在兵戈尚未被歌頌、武力尚未被神話之前，他已經替後來的人，把界線劃好 - 什麼可以用，什麼不可濫；什麼是討伐，什麼只是殺戮。

他不需要以血證名，也不曾要求被記住。功成之後，他退得極遠，遠到只剩下史書裡的幾行字，與道教神譜中一個冷靜的位置。沒有怨氣，沒有傳奇，甚至沒有足夠的情緒，讓香火為他停留。

後來，武廟的門開了又關，關了又換。有人進來，有人坐上主位；有人必須被反覆洗淨，才能承受人們投射的忠義；而他，卻因為太過完整，反而顯得多餘。於是，他被請出了廟門，卻沒有離開。他只是站回歷史該站的位置，看著後來的一切各自表述。

若有一日，你在某座被稱為武廟的殿前，忽然感到一絲遲疑。不是因為不敬，而是因為你想起 - 曾經有人，把武力當成一件必須被約束的事。

那一刻，無需香火，無需名號。他已經來過。